

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。唐代中后期出现藩镇,并非是分权制的产物,而是在唐代经济制度、军事制度等方面发生变化后,统治者未能洞悉时局变化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的结果。安史之乱后,唐政府一直在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。以往研究者多是从藩镇的视角看待唐中后期的历史,这样就模糊了唐中后期中央集权的强化轨迹。加强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,有助于我们认清唐五代宋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历史,为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增添更多内容。因此,更期待唐史工作者不断挖掘新史料,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,凝炼出更多新的见解来充实这一研究领域。

近二十年南汉史研究概述

张金铄

(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)

南汉是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。南汉割据对于五代局势演变以及岭南经济发展,都产生过重要影响。新中国建立以来,南汉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,已有专门介绍(见张金铄《本世纪以来南汉史研究概述》,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1994年2期)。之后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,特别是南汉德陵、康陵的发掘,为研究南汉史提供不少新的资料。近20年来,发表相关论文就有近60篇,本文试对此研究进行总结。

一、政治史研究

南汉自后梁贞明三年(917年)刘岩称帝,到北宋开宝四年(971年)后主刘鋹被俘,凡割据55年。南汉前期政治稳定,开设科举、学校,重用士人,后期则宠任宦官,滥施淫威,赋税沉重,境内矛盾激化。学术研究集中在其政治兴衰、南汉君主以及宦官等方面。

关于南汉政治兴衰方面,张金铄发表《封州与岭南刘氏的兴起》(《岭南文史》1995年1期)和《南汉割据及其政治设施探析》(《合肥学院学报》2004年1期)两篇文章,前者考察封州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南汉兴起过程所发挥的作用,后者考察政治设施,兼论其割据的各种因素。作者认为南汉是在中原动荡环境下割据的,中原局势稳定后,南汉就失去存在的基础。曾国富《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的兴衰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5年3期)以及张金铄《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》(《社会科学家》2000年5期)考察南汉士人活动,南汉前期依靠北方南迁士人,建立政权和政治设施,这些对于岭南地区开发和政治稳定都起到积极作用,但后期疏远士大夫,重用宦官,导致政治腐败和国力衰落。曾国富《纸醉金迷兴王府——南汉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及其影响》(《湛江师院学报》2001年5期)考察南汉政治腐败及其社会危害。何浩灿《试论五代十国时

期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发生原因》(《浙江师大学报》2003年1期)考察闽、楚、南汉宗室内争及其原因。顾吉辰《论宋太祖统一岭南》(《广东社会科学》1990年2期)分析北宋统一岭南的必然性以及过程。

关于南汉政治人物研究,主要讨论南汉君主及宦官问题。唐森《南汉刘氏族属平议》(《暨南学报》1993年1期)就南汉刘氏族属进行分析和评论,认为日本藤田丰八“大食后裔说”、刘美崧“傀儡说”证据不足,南汉刘氏应该是南迁汉人后裔。张金铄《南汉开国之君刘岩》(《文史知识》1994年10期)肯定刘岩发展经济、保境安民各项设施,又对其后期任情生杀,宠任宦官予以抨击。曾国富《南汉国主刘龚简论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4年3期)及《南汉四主》(《广东史志》2001年3期)对南汉高祖刘岩、殇帝刘玢、中宗刘晟、后主刘鋹进行较为详细评论。

南汉宦官势力强盛,史载高祖刘岩“末年尤猜忌,以士人多为子孙计,故专任宦官,由是其国中宦官大盛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83,后晋天福七年条),到后主时期宦官发展到七千人,“贵显用事之人,大抵皆宦者也,谓士人为门外人,不得预事”(同上书卷284,后周显德六年条)。南汉宦官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,不少著作都曾提到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陈华新《历代宦官大观》、卫文选《历代宦官》、余华青《中国宦官制度史》、张式苓《中国古代的宦官之祸》、任洪《中国古代的宦官》等著作都提到南汉宦官势力之盛。论文方面,张金铄《南汉宦官势力初探》(《广东社会科学》1994年3期)考察宦官势力形成及其原因,认为南汉建国于岭南,这里素有使用宦官习俗,也是唐代宦官的主要来源地;曾国富《论南汉宦官专政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5年1期)和唐森《话说南汉刘龚与宦祸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6年1期)主要讨论宦官对南汉政治影响,认为宠任宦官是南汉迅速腐朽的重要因素。

二、经济史研究

南汉时期岭南经济较早引起学者的注意。南汉割据自雄,“内足自富,外足抗中国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卷5,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条)新旧《五代史》中也提到南汉“珠玉之富”。蒋祖缘、方志钦主编《简明广东史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3年),方志钦、蒋祖缘主编《广东通史(古代卷)》(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6年)以及黄启臣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》(广东经济出版社,2003年)都对南汉时期岭南经济发展给予肯定。李庆新《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》(《广东社会科学》1992年6期)考察南汉经济发展,内容翔实。另外,崔勇《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》(《广东经济》2003年2期)、雷学华《试论南汉宋朝时期岭南的开发》(《广西民族研究》2009年1期)也各从不同角度探讨南汉经济状况。

南汉重视通过对外贸易,通过贸易获取巨额财富,史称其“珠贝、犀象、瑇瑁、翠羽,积于内府,岁久不可较”(路振《九国志》卷9《邵廷珪传》,守山阁丛书本)。在这方面,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》在第四章《隋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》专列“南汉朝廷对南海贸易的重视”,考察对外贸易政策及其发展状况。张金铄《略论五代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》总结南汉对外贸易及其发展水平。周加胜《南汉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》(《求索》2008年3期)分析自唐以来岭南地区对外贸易管理及其状况。李庆新《濒海的国度: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》(载《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》,线装书局,2006年)内容颇为翔实,包括五部分:其一,“小南强”:

南汉开国及其与五代各国的关系;其二,刘氏祖籍与族属:汉人,阿拉伯人后裔,还是蛮夷?其三,笼络蕃商:南汉朝廷与南海贸易;其四,印坦(Intan)沉船:从考古发现看南汉与南海交通;其五,筦榷之利: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及其长远意义。

南汉铸造“乾亨重宝”铜钱和铅钱。新中国建立以来,人们在阳春、南宁、广州、连县等地发现这些铜钱、铅钱以及钱范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,邱立诚《广东阳春县发现南汉乾亨重宝石范》(《中国钱币》1996年3期),王贵忱《南汉的铅钱——广东最早的铸铅钱问题》(《南方金融》1982年11期)、邹坚《南汉铸币浅谈》(《南方金融》1984年1期)重新考察这些出土的铅钱;稍后,许桓在《西安金融》1996年6期发表《南汉乾亨重宝铅钱》,介绍其钱币形制和重量等问题。汪有民《南汉货币说略》(《西安金融》1996年10期)系统介绍南汉使用钱币问题。徐钢《南汉乾亨重宝背“邕”铅钱考》(《广西金融研究》1998年1期)、周庆忠《南汉铸行铅钱补遗》(《广西金融研究》2007年1期)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。这些研究使我们对于南汉钱币使用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。

三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研究

南汉是在中原动荡条件下建立的,如何处理同中原及周边政权之间关系,直接影响其政权的生存。南汉周围有楚、闽、南诏、前后蜀等政权,还有中原地区的五代王朝。《新五代史》总结南汉刘岩“志在五管”(卷66《楚世家》),稳固在岭南地区的统治,进而与周边及中原地区建立关系。李东华《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》(张炎宪主编: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》第六辑,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,1997年)主要讨论三个问题:南汉在五代变局中的地位、广州对外贸易以及交州与南汉关系。赵建玲《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概述》(《安徽大学学报》2002年3期)认为南汉政策务实,尽管与楚争夺岭南桂管,大体上采取“辑睦四邻”,重视与周边政权政治交往和贸易往来,同时关注中原局势并以此来调整政策。高学钦《五代时期十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特征分析》(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》2008年8期)按照对中原王朝态度的不同,把十国分为对立型、依附型和摇摆型三类,南汉大体上属于摇摆型,时而称臣,时而对抗。刘复生《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》(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1年2期)还考察南汉“西通黔蜀”,特别是与南诏的交往活动。

南汉与安南关系复杂。安南为唐代岭南五管之一,唐末由曲氏父子割据。高祖刘岩曾取安南,俘静海节度使曲承美。后在白藤江为吴权所败,中宗时吴氏复遣使称臣,然南汉“但羁縻而已,终不能实有其地”(吴兰修:《南汉纪》卷2,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3年)。楚汉《略论吴权与南汉白藤江之战》(《东南亚纵横》1990年4期)及《五代宋初越南历史三题》(《东南亚纵横》1992年4期)考察南汉与吴权白藤江之战经过,分析战争对岭南局势产生的影响。陈欣《南汉与安南交往考》(《东南亚研究》2009年1期)考察南汉与安南交往过程和特点。

四、地理及文化研究

唐代岭南分为五管,南汉刘岩建国初期仅有广管、容管、邕管之地,交州(安南)得而复失。

中宗时期,趁楚国内乱取桂管及郴、连二州,交州遣使称臣,“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90,后周广顺元年条)。南汉时期州县多有改置,《旧五代史·地理志》因内容散佚而所言不详,《新五代史·职方考》则云“自岭南北,四十七州为南汉”。《宋史·南汉世家》称,开宝四年二月平南汉,“凡得州六十、县二百四十、户十七万”。清吴任臣《十国春秋·十国地理表》以南汉有兴王、齐昌二府及六十四州,吴兰修《南汉地理志》则南汉六十二州,县二百一十四,未列兴王、齐昌二府。

梁元在《南汉地理志考异》(《岭南文史》1985年1期)曾对吴兰修《南汉地理志》进行分析 and 辨误。近年有不少论著考述南汉州县建置,其中梁允麟《南汉地理沿革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5年4期)赞同《宋史》说法,并对南汉六十州及其辖区进行辨析。梁允麟又有《梅州及其邻区历史沿革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5年4期),与吴榕青《潮州历史政区地理述略》(《岭南文史》1998年4期)均考述梅州(南汉称敬州)政区形成及其演变。吴国强《广东各县的设置和命名》(《广东史志》1996年4期)依据北宋《舆地纪胜》等资料考述雄州建置过程。刘茂真《南汉是邕州未改诚州》(《广西地方志》1997年1期)辨别五代改邕州为诚州之非。邹永祥《惠州建制沿革述略》(《岭南文史》1996年2期)考察南汉时期改循州为桢州、桢州辖境以及北宋避仁宗名讳改为惠州的过程。郭声波《唐五代岭南道岩州、常乐州钩沉》(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》2001年3期)考证常乐州本为岩州,刘岩称帝时改为常乐州,其辖境约当今广西北海、合浦及广东廉江西部分地区。陈鸿钧《南汉兴王府暨常康、咸宁二县设置考》(《岭南文史》2008年1期)主要讨论南汉刘岩建国后模仿汉唐都城,设置畿辅政区情形。

南汉模仿唐制,“立学校,开贡举,设铨选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71,后梁贞明六年条),文化上亦有建树。清梁廷楠在《南汉文字略》、《南汉丛录》总结南汉文学成就和轶事,其《南汉书》“诸臣列传”多记宰辅、文苑、仙释人物。陶懋炳《清人梁廷楠与〈南汉书〉》(《湖南师大学报》1992年1期)高度评价梁廷楠在南汉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。《广东通史(古代卷)》在第八章《南汉的兴亡》中专列“人文继起和佛教风行”,详细叙述南汉文化发展状况。蓝武《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研究》(《社会科学家》2004年5期)根据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及其他材料,论述南汉进士八人人及岭南五代进士六人,并分析南汉科举的基本情况。张金铄《南汉历法初考》(《学术研究》1996年10期)根据梧州南汉铜钟铭文,结合五代史籍,认为南汉历法与五代王朝有别,其所用历法为南迁士人所拟定。另著《南汉史料史籍述评》(《安徽大学学报》2003年5期)梳理南汉史料及史籍,分别考察其学术价值。

五、考古及文物研究

近年来随着地方建设的加快,一些南汉遗址和文物被清理出来。继20世纪50年代南汉中宗刘晟昭陵发现以后,2003年到2004年,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东南郊小谷围岛发现南汉刘隐德陵和刘岩康陵,该项成果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。尽管陵墓被盗而出土文物受损,但二陵发现仍澄清了南汉史研究中的不少问题。全洪《南汉德陵考证》(《文物》2006年9期)从小谷围岛青岗“刘皇家”的墓葬形制结构、出土器物,结合文献记载,认为这座南汉大墓就是刘隐的德陵。德陵的发现纠正了明《封川县志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中刘隐葬封州(今广东封开)刘王

岗的记载。德陵出土的青瓷罐和釉陶罐胎质坚硬,釉色以青为主,间有淡黄色或青灰色,晶莹透亮,为研究五代陶瓷器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。康陵还出土了玻璃器(《广州南汉德陵、康陵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6年7期)。张强祿《南汉康陵的陵寝制度》(《四川文物》2009年2期)从陵园制度考察,认为康陵规模不大,但整体沿用唐制,又显示自身特色,对宋代陵墓之制亦有影响。

南汉钱币、建筑遗迹及遗址考古也有新的发现。1999年到2000年在广州光孝寺出土不少“乾亨重宝”铅钱。1997年在南越国御苑挖掘过程中,发现南汉石山莲池;2000年在广州儿童公园内发掘出南汉殿堂建筑;2002年在儿童公园南侧发现宫殿建筑的石板铺地面;2003年在广州中山四路与文德路交汇处的致美斋工地,发现南汉大型礲礲建筑基址;2004年在广州麓湖路南方电视台工地发现的建筑遗址,很可能与南汉甘泉宫及其附属建筑有关;同年在广州芳村大道也清理出南汉建筑遗址,礲礲规模较大,建筑材料也相当丰富。这些都为我们的南汉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。张其凡、陈欣《1949年以来有关南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》(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2009年2期)介绍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关南汉考古发掘情况。

在文物文字释读和研究方面,也有一定成就。朱家振《广州南汉德陵、康陵发掘简报》附载《康陵地宫哀册文碑》照片,并进行文字释读,便于人们利用。后来吕蒙在《南汉〈康陵地宫哀册文碑〉释文校正》(《宜宾学院学报》2007年8期)中,就其中13处文字释读提出异议并重新释读。李发《南汉〈康陵地宫哀册文碑〉释文补正》(《文物》2007年8期)也对其中五处文字进行考辨。另外,若谷《梧州南汉铜钟及铜钟歌碑》(《广西地方志》1994年3期)考察铜钟铭文学术价值,并阐释“铜钟歌碑”内容。

在南汉遗址和文物保护研究方面,杨宏烈《广州南汉宫苑残粒的保护与拓展》介绍南汉西湖药洲九曜园的文物价值和艺术特色。周加胜《南汉时期广州城市布局及建筑研究》主要考察兴王府(广州)城内宫殿布局及城外四周建筑分布与遗迹。刘成基《南汉时期广州的发展》(《羊城古今》1992年4期)考察南汉广州城的建筑与城市规模问题。陈泽泓《南汉兴王府建设及其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》(《岭南文史》2001年4期)从兴王府布局对广州城分区及中轴线、兴王府建筑对岭南建筑风格、兴王府园林对岭南园林风格等影响方面考察,认为南汉确定了广州城市分区的新格局,也开拓了岭南园林建筑的新境界。吴庆洲在《华中建筑》1995年第2、3、4期连续发表《南汉遗迹药洲园重建设计》系列论文,分析药洲园(九曜园)的历史和现状,提出规划重建方案。

总之,南汉史研究因其文献资料较为零散而稍显逊色,然近20年来不断的考古发掘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不足的缺陷,南汉史研究呈现迎头赶上的趋势。目前从事南汉史研究的学人不断增多,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。

补 正

本刊2011年第1期《“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环境基础”学术研讨会综述》的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大海。特此补正。